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简介(下)

何　　讯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所收到的论文，除属于总论、政治、军事、法律、人物评价、经济等方面外，还有论及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政策、政治学术思想与科技，以及其他内容的文章19篇。这里，粗略归类，予以简单介绍。另外，魏鉴勋、关嘉录与林树惠同志两篇论文在已发表的简介中未曾收录摘要，本文一并绍及。

一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

傅贵九在《明清的蛋户》一文中指出，蛋户起源很早，《华阳国志》书中已有记载。从地理分布看，蛋户最早在四川、云南等西南省区活动，以后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徙，至迟在唐宋时已经开始在两广及福建沿海定居。文章说，自从明代把蛋户从户籍上划分出来单独成类，这意味着蛋民在身份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与一般人户不一样，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另眼看待的一种特殊人口。这种著籍办法直到雍正初年废除贱籍才有改变。蛋民以船为家，常年在水上生活，捕鱼采蚬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生活极端困苦，常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过着饥寒交迫的岁月。明清两代，蛋户内部有所分化。“有渔人者，有渔于人者”。还有少数人因从事某种经营致富，移居岸上，买田置产，成为蛋户中的上层。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过着朝不谋夕的生活。明清时期蛋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彼伏此起，接连不断。明中叶后，活跃在闽、粤沿海的“海匪”、“珠贼”、“艇匪”等，很多就是蛋民的武装，或是有蛋民参加的武装集团。文章扼要地叙述了清初蛋民起义的斗争事迹。

徐和雍的《“堕民”初探》着重对浙东“堕民”的由来，社会地位及其脱籍和解放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堕民”阶层发端于南宋初年，形成于明初，是封建时代政治迫害的产物。后来，由于其他的原因，把某些劳苦群众也纳入这个阶层，从而成员变得复杂起来。“堕民”虽与奴隶不同，他们已经相当“自由”，但是，与四民之间仍存在着一种隶属关系。他们人身并不完全自由，在政治、职业、婚姻以至服饰、住宅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其社会地位近似农奴，所受歧视的严重程度则较农奴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清代，由于朝代的更替，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渐变化，解脱“堕民”问题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作者认为，清初削除“贱籍”似与赋税制度改革有关。但是，这项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革措施，清统治者进行很不得力，而且仍加以种种限制，并无实际效果。

天地会是清代重要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就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关于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所谓“乾隆二十六年说”和“乾隆三十二年说”进行了分析和驳议，证明天地会并非创立于乾隆时代。万提喜虽是乾隆年间在闽粤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但不是该会的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和天地会内所称起会人“洪二房和尚”也不是一码事。作者认为天地会是为着反清复明而成立的，它是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亡、中国大陆公开武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逐渐转化为阶级矛盾不久的产物，具体时间应为康熙甲寅十三年。

杨绍溥在《关于李文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一文，详细考察了李文成自称十八子的原因及其历史渊源。作者认为，李文成称十八子，上溯其源，可推到东汉末年原始道教中李弘的出现，李氏当兴的宗教预言一直延续了一千五、六百年，李文成自称十八子正是李氏当兴这个宗教预言的继续。文章说，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时期，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加以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人民的反清斗争极其复杂纷纭，白莲教和其他秘密组织异常活跃，而这些秘密组织之间互相渗透，同一组织又有分化，在民间长期存在的李氏当王的谶言就以不同形式出现于阶级斗争的风浪之中，李王也就更换着色彩不同的服装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之上，严霜十八子李文成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列举雍正以来白莲教和其他秘密结社借用李开花名义进行活动的大量史实之后指出，雍乾时代的李开花，只是李氏当王这一古老谶语的一种特殊表现，提出李开花仅仅表现了推翻清最高统治者的愿望而已，文章不同意日本学者铃木中正把雍乾时代出现的李开花说成是“民众的理想政治的象征”，是“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见解。

喻松青在《天理教探研》一文中，认为天理教的名称，始见于嘉庆十三年，该教原系八卦教的一支，但它吸取了弘阳教“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的教旨，所谓白阳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理想的彼岸，而是即将推翻的当今的红阳统治而建立的新世界。作者指出天理教的等级观念，即“位利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这是用中国旧有的传统的思想资料，表达了天理教的另行组合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内容。并且认为天理教的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还有太监、包衣和朝廷的官员。另外作者简要地介绍了林清、李文成其人，以及他们起义的经过。

马西沙在《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中说，产生于清代华北地区的八卦教的根本特点是，以八卦作为宗教的组织形式，招收门徒。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中叶，是八卦教初创和发展的时期，该教门由几个逐渐形成的世袭家族所把持，发展成为一个被地主集团利用的宗教。从乾隆中叶到嘉庆末年，由于清朝政府的镇压和教内农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世袭传教家族走向衰落。八卦教的教义既是儒、释、道三家内容的杂揉和曲解，又有秘密宗教共同信仰的一些内容，到了乾隆中叶该教已把宗教化了的儒学放在教义的首位。刘姓教首虽有浓厚的排满兴汉思想和登基的野心，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直到华北农民阶级要求变革现实的力量把林清、李文成推上宗教领袖的地位后，八卦教才真正走上反清斗争的现实道路，其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八卦教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表明农民阶级正在以自己的壮烈行动迎接着近代中国更加伟大的革命风暴。

二、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

李景屏在《清初民族政策初探》一文中对清初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作者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确立了以建立和巩固满蒙联盟为基石的政策体系，解除了清军南下的后顾之忧和兵源不足的困难。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对传统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为同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为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夺取长江流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福临亲政后，进一步缓和了民族矛盾，继续大量地任用汉官，扭转了清军在中南、西南和东南地区的被动局面，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作者指出，因俗而治，保留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因时而异不断补充，这是清初民族政策的三大特点，它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仍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何溥滢在《清代前期满族的发展变化》一文中，首先从官庄和旗地进行考察。满族入关

后，由于战争不断，男丁长年在外打仗，另外驻防地离所分旗地遥远，不便耕作，所以放弃了以前封建农奴制的经营方式，而普遍采用汉族地区的封建租佃制，这是满族发展史上一个重大变化。其次从习俗和文化进行考察，这个时期，满族在各个方面都积极向汉族学习，吸取了汉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即逐渐汉化。作者认为满族社会从生产方式到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肯定。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满族族体中有汉族的成员；二是满族的共同地域被打破；三是满族本身的进取精神；四是满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范同寿在《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中说，土司制度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封建领主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到了清初，不仅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严重地危害封建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不仅是一场区域性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内容，不能把改土归流本身与军事镇压问题混为一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实质上是从清初到康熙年间，中央政府为削平地方割据，统一国家权力，巩固四围边陲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的继续，因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打破了民族壁垒，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张捷夫在《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问题》一文中，首先谈了雍正时期西南改土归流的地区，作者认为现在有些论著中把改土归流与在既无流官，又无土司的地方设官建治混为一谈，虽然这两件事都是鄂尔泰等人经办，并且同时进行，但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应该分别对待。其次谈了如何看待改土归流过程中发生的反抗斗争及其性质，作者指出雍正改土归流，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的，清廷几次较大规模的用兵，是由于封建领主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煽动叛乱，因此不能认为封建领主的这种行动是进步的。改土归流后，雍正帝针对当时出现的矛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对被革职的土司要妥善安置，使其得所，二是对派驻流官，要用人得当，这对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和维护在西南的统治，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政治学术思想与科技

李洵在《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在“郡县、“钱粮”、“生员”、“军制”、“形势”、“田功”、“钱法”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我国十七世纪中叶前后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体制改革、白银之成为货币、地方政治势力之生长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开展问题等等。作者认为顾氏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我国封建社会发生比较深刻变动的反映，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有所发展的反映。从这些反映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和深度。十七世纪中叶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资本主义萌芽曾有过一个长足发展时期，之后，却进入发展延缓时期。从这一时期社会问题的变化可以看出，清初封建制再度由动荡趋向稳定，资本主义因素受摧残而形成衰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不但未削弱，反而加强了，地方政治势力严重地受压抑，难于成长；封建统治不但继续下去，而且加上了民族统治的枷锁；十七世纪出现的初期民主思潮，被禁制而归于泯灭；各种政治或经济上的改革运动几乎不见了；十七世纪初已经开展起来的市民运动，又平息下去。因而十八世纪初年在世的思想家颜元等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已不再主张改革而趋向复古了。

谢刚在《〈明夷待访录〉与清初文字狱》中指出，历来认为黄宗羲是汉民遗老朱明孤臣，

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但从其政治思想结晶的《明夷待待录》来看，很难发现这两方面的内容。因为康熙即位之初，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时，民族思想以至恢复明室的思想已不占主导地位。这部著作具有反清意识的论点，既非根据它的实际内容，也不是根据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而是主观上的一种推测。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梁启超。实际上，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是清初地主阶级在野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运动是以雍正和乾隆年间文字狱的形式来结束的。《明夷待访录》以谈历史的方式，以清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明末以来在野派的党议观念，中心内容是鼓吹朋党政治，削弱君主权力，建立与君主同议政的宰相制。

杨乃济、冯佐哲在《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一文中，对雍正帝是否真是“性喜祥瑞”，他喜欢的是何种祥瑞，他的天人感应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实质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剖析。作者认为雍正帝是一个务实派，他很懂得政治上的两手策略，既重政务、吏治的整饬，亦不轻对思想、舆论的控制。因此雍正帝利用祥瑞与天人感应推行其政事，驱策天地鬼神皆为其所用，并将这一切均导入为实现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轨道。作者不同意现在评论雍正帝的一些论著中，多以祥瑞与天人感应列入宗教迷信，荒诞不经的消极面而予以鞭挞。

王俊义在《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一文中，首先认为乾嘉学派产生原因是和康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经济上的发展繁荣，文化上的大力倡导有关。而不同意以往流行的看法，说成仅是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实行民族高压恐怖政策所致。其次认为乾嘉学派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自身产生、发展、演变和没落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乾嘉学派的奠基人是清初的顾炎武，先躯是阎若璩、胡渭，正式形成则是惠栋，高峰则是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自此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特别是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于是易于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便逐步代替乾嘉学派而兴起。最后关于对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若以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都是不对的，尽管乾嘉学派在管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不能对一些重大事变作出规律性的解释。

阎崇年在《清代史坛大家孙承泽述议》一文中强调指出，清初，顾炎武等人坚持夷夏之防，亮节不仕，忠介可嘉；孙承泽初录东林，继降大顺，终人清朝，也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大节不亏，无可非议。孙承泽晚年闭居，学志弥坚，在批判空疏无本的王学中，他崇实尚变。崇实，使他斥空疏，务实际，勤奋广罗资料，分门别类，编纂史书；尚变，则使他在三易其主的鼎变中识时务，顺潮流，知进退。搜藏书籍、闭门纂述、会友切磋、以史还史，以上诸点在封建史学家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它却是孙承泽成为清代史坛大家的重要因素。他的《天府广记》是第一部系统翔实地记述北京历史的鸿篇巨著，北京史学之兴，孙承泽开其端。在哲学上，孙承泽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见解，在政治思想上，他主张以法数制治国君，比黄宗羲君权与相权并重的思想还要深刻，实为我国近世君主立宪思想的萌芽。

南柄文在《邵晋涵的史学成就》中说，邵晋涵是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在经学、古音韵学、金石学、方志、辑佚等方面都有精深研究，其中史学成绩尤著：他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重要撰稿者；重辑《旧五代史》；改编《宋史》；熟悉明清史；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邵晋涵主张，史书语言的文质要根据历史实际，史书内容应详记朝章大政，反对猎奇，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要慎重、公允，发扬据实而书的优良传统，反对记载荒诞迷信事物，讲

究体例，重视以约驭博的专著。邵晋涵在史学方面获得成功，客观上，主要是他出身于重视文化教育和学术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乡浙东地区富有治史学的优良传统，便于治史的职务条件，与许多著名史家交往，互相启发的缘故。强调封建道德，主张用史书宣扬忠孝节义，这是邵晋涵史学思想的糟粕，是他具有地主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

张小青在《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中说，我国虽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地，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过重大贡献，但自明清以来，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这主要是封建制度的局限和统治阶级的腐败所造成的。西洋火炮输入中国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亡清兴的原因。此外，当时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华立足传教，西洋火炮的输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火炮是多种科学的结晶，伴随它的输入，西方的数学、冶金、化学等各种科学技术也介绍到中国来，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等许多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我国与西方的差距，徐光启甚至提出学习和赶上西方的建议，这说明，西洋火炮的输入，不仅使我国分享了西方各国的科学成果，还使我国长期与世隔绝、故步自封的社会受到了一种外来的刺激，有利于封建社会的解体。

四、其他

侯寿昌《康熙母系考》，叙述了孝康章皇后佟氏家族的世系，佟家一门附金降清及其在清王朝中得宠、兴旺发达的历史过程，文章指出，孝康章皇后、孝懿皇后、懿惠妃、孝慎皇后，皆出于佟氏一门，而任将军之职者五人、都统者十三人、六部尚书四人，总督、巡抚十数人，佟氏家族俨然成为子孙显贵、宠眷甚殊、望冠椒房的皇亲国戚和权倾国内的豪门贵族。作者认为，清朝统治者和佟氏家族是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君臣关系，而它正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宗法制、家长制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

王树卿《清代公主》一文就公主之册封、公主下嫁、公主下嫁的几点有关规定作了论述。文章首先就公主、格格和额驸的品级规定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所谓固伦、和硕，只表示公主的等级，并非公主封号。乾隆以前，公主的封号加在和硕或固伦与公主之间。从嘉庆朝始，公主的封号改冠于前。清代公主的品级晋封也有与典制相违的特殊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需要、皇帝与公主（包括公主的生母）感情的亲疏。

五、补遗

魏鉴勋、关嘉录的《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初探》一文，利用康熙朝黑图档具体叙述了盛京内务府皇庄的由来与发展、赋役制度、组织管理及其内部的阶级关系。作者认为，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属于封建农奴制性质。这种庄园经济在清代前期仍是满族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当时中国广大地区的小农经济相比，尽管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在清初动荡的社会中，它却凭恃“皇产”的特殊地位，不被侵扰，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庄丁的生活得到基本保证。加之康熙帝注重对皇庄的管理，调整皇庄内部的生产关系，发展庄园的生产，从而使庄园经济才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盛京内务府皇庄数目逐渐增多，土地逐渐扩大，人丁逐渐增加，剩余产品越来越丰富。对于当时东北地区的开发和清朝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的侵略都起过积极作用。因此，不能因为盛京内务府皇庄是封建农奴制经济就一概予以抹杀，应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林树惠在《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一文中，通过对明末清初威忒初犯广州，英船在台湾、厦门、定海、宁波等地的活动，以及洪任辉的北上，喀塞卡特的来华等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从明末开始，到南京条约签订为止，不论英国商人还是他们的政府，其思想

都是一脉相承的，表面上好象是为了扩大贸易，没有领土野心，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侵略的基地。例如，从威忒到喀塞卡特等人，都建议英国政府夺取海南岛为属地，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侵犯台湾，依据舟山为基地等，都与明清以来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分不开。

清代人口研究述评

高　王　凌

最近几年，由于对我国人口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因而在历史研究方面，对人口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逐步开展起来。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增加最多最快的时期，它直接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础。有清一代，人口因素又与皇朝的兴衰密切相关，它在清代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史中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清代人口研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近几年中（1978—1982年），关于清代人口问题共发表有几十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清代的人口思想、清代人口的增长及其数量的估计、人口问题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对策等许多方面。以下仅就所见，分题介绍，间及一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清代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在这方面，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较早较多地受到人们的注意，例如洪氏对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增加的看法和忧虑，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思想。近几年中，研究的一个侧重点表现在对洪氏思想评价的转变上，这可以从胡寄窗两篇文章（《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十五章二节；《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的对比中看出部分，李世平文的标题《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吗？》（《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也反映了这种趋向。洪亮吉之外，还有文章讨论了汪士铎、薛福成的人口思想，指出其中也有很应重视的一些方面。然而，对于清政府特别是康熙皇帝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出发，那些对清代历史特别是经济史的实际运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事，必然会引起更大注意；从1981年初以后，像洪亮吉人口思想一类的文章已不多见，而让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

二、关于清初丁口统计对象问题：在清代官方统计中，清初顺、康、雍三朝的“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万左右，到雍正末年才达到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朝和乾隆以后，“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而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突破了两亿，以后又进而达到三亿、四亿，远迈历代，并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础。这中间（从康、雍年间到乾隆初年）是有着一个“飞跃”么？这样的“陡增”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长时期中，有不少学者混同了前后两种统计对象，对这一“陡增”迷惑不解；也有人把清初编审对象问题做为尚未解决的“悬案”（详见马小鹤《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1979年）指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是不同的。尤应指出，该文所提到的孙毓棠《清代的丁口纪录及其调查制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六卷二期，1950年），已对这些问题做过详明的阐释。